

# 中國南方地區與日本列島之間文化交涉的歷史蹤跡考察

## ——東亞古代文明共同體的實像研究——

嚴紹盪

### 序

依據中國古文獻記載，公元前4世紀時代，日本列島上的“Ainu”族群開始了與中國的聯繫，主要以朝鮮半島為雙方交涉通道。大約在公元6-7世紀開始，“Yamato”族群開闢了以東海為中心，以中國南方相關口岸為登陸據點的對中國的海洋通道。追尋這一交涉的歷史蹤跡，闡述雙方在“身份均衡”的政治框架中提升的中日文明交涉的智力品質、速度和容量，對於把握和理解古代“東亞文明共同體”的“實像”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意義。

### 第一節 早期交涉

中國古代文獻中關於“東亞交涉”的最早記錄，目前可以確認的是在被推斷為公元前4世紀時代撰寫的《尚書 禹貢》之中。該書首次記述海外“島夷”分為南北兩路進入“冀州”和“揚州”。考古學的研究提供了亞洲大陸華夏居民把“稻米農耕”、“青銅器物”傳往日本列島的更早的材料。但是，這些記載表述的可能是“日本列島”上的“原居民”（Proto-Japanese）與華夏的交涉，而不是目前學術界廣泛關注的作為族群（民族）和國家實體的“日本”和“中國”的關係。

我歷來主張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考察“東亞文明史”，日本列島上古以來事實上存在着以兩個不同族群分別為主體的政治實體，此即以“Ainu”族群為主體的部落和部落聯盟，中國古代文獻中最早稱為海外“島夷”，規範的名稱為“委”或“委奴”（上古漢字系統中“委”是“倭”的本字，漢語“上古音系”中“歌”部，擬聲“A”或“AI”，由此推論，“委（倭）奴”應該擬聲為“Anu”或“Ainu”）。在“Anu”（“Ainu”）之後，繼之出現的則是以“Yamato”族群為主體的“日本”（早期“日本”有時也自稱“倭”或“大倭”）。中國《新唐書》保存有關於這一國家實體出現的世界最早的文字記錄。

“中日關係研究”（包括文化關係研究）在“時間”和“空間”概念中應該分清這兩個不同政治實體與亞洲大陸的關係，否則會造成一系列闡述的錯訛。例如，目前在歷史學界流行的把兩千年的“中日文化關係”放置在中國古代的“冊封制度”中考察，則完全是“歷史時空錯位”製造的“虛影”。

近兩千年來中國與日本列島的政治聯絡和文化聯絡，在沒有如同當代的電子手段之前，全部是依靠“人的往來”實現的，於是“人”的“活動區域”形成了研究中的“歷史聯絡的地域考察”。依據現有的文獻材料和民族民俗資料，我們可以大致判斷，在公元6-7世紀之前，中日之間的聯絡主要是把朝鮮半島作為通道而得以實現的，這就是以“北方區域”為中心的

聯絡時代，這是日本列島上“阿伊努”族群的多種部落和部落聯盟與華夏的（即中國各個朝代的）主要通道。這個時間段落中的“中國和日本列島的關係”確實存在著“冊封”的事實，18世紀在九州志賀島發現的“漢委奴國王印”，就是一個“物化”的證據。這個印璽可以證明，中國漢代王朝“冊封”的物件確實就是“Anu國王”，也就是由“阿伊奴”人組成的政治實體的首領，並不是日本列島後來的“Yamato”族群的“天皇制”國家實體的首腦。而且，即使在這種“冊封”狀態中，這種“冊封”也並未形成“制度”。

自漢代以來，包括魏晉幾代的中國元首，對於“Ainu”的“追求冊封”一直是採取“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基本策略，但現在有些研究者把中外關係中的這種“冊封”，表述為中國幾千年來的“對外的基本戰略”，在時間概念上加以無限延伸到19世紀。由此而有研究者提出“古代日本國民一直生活在中華大帝國的陰影之中，長期懷有受到壓抑的心理狀態”，這樣的表述顯然與歷史實像完全不合。現有的多元史料表明，我們可以以公元6-7世紀作為“絕對意義”上的界線，日本列島上“Ainu”族群組成的“政治實體”已經潰敗，作為日本列島上新形成的移民族群“Yamato”（漢字標記為“大和”）已經創建了新的國家政治實體，成為“中日”之間政治、文化與經濟交涉的主體。以這個國家向大陸派出的第一次“西海使”為標誌，日本列島對中國大陸的聯絡開始了以東海為核心的“海上交通”，以中國長江之南的古代港口作為登陸點，逐步發展為中日之間的“正面通道”。

誠如研究者所知道的，由日本朝廷派出的“西海使”的《國書》的開首寫有“東天皇敬白西皇帝”、“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等等的身份表述，顯示了一個新的東方政治實體主張的“主權平等”的意志（我這裡是借用了“主權平等”這一現代概念，即堅持身份地位的均衡性）。中國王朝對這樣的主張並沒有過渡的“不良反應”，這樣一種最基本的政治勢態，事實上就考問了當代東亞史學研究者特別強調的“中國歷代冊封制度論”，它不僅是脆弱的而且是虛構的。這種事實上的中日歷代王朝之間元首的“身份地位均衡性”，奠定了6-7世紀以來到19世紀中期近1300年間中日文化關係的基本的政治框架。由此而發展著的“中日文化交涉”是一直在這樣的政治框架中進行的。本次研討會以中國南方區域在中日文化交涉中的功能與價值作為主題，我體會在本質上就是研究6-7世紀以來在日本列島上形成的以“Yamato”族群為主體的新的政治實體“日本”與中國各個王朝之間在古代兩國“主權均衡”的政治框架中的文化交涉，從而展示古代“東亞文明共同體”的基本內容與它在運行中的多元機制與可以啟示當代中日之間以及整個東亞的文化互動的歷史經驗。

依據文獻資料、考古資料、民族民俗資料等等的材料，我們大致可以確認自6-7世紀以來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涉”一開始就是以廣袤的中國南方區域為中心不斷展開的。日本使用的漢字中有音讀和訓讀兩種形態。其中的音讀形態主要分為“吳音”和“漢音”兩大系統。所謂的“吳音”是由中國南方地區發音為基礎的“音讀”，為我們理解中日文化關係開始的“區域”概念，提供了很貼切的歷史證據。所謂的“漢音”是以中國唐代中原地區發音為基礎的音讀，為我們理解中日文化關係開始的“時間”概念，提供了很貼切的歷史證據。這兩個“漢字音讀”發音系統的生成，為中日文化交涉開始於公元6-7世紀左右的中國南方區域提供了最有力的“時空”證明。

由此開始的中日政治、文化、經濟的交涉以“海上通道”為正面交通，以中國南方區域為進出的基地，對於推進“古代東亞文明共同體”的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功能。

## 第二節 東亞文明共同體的層面

由於中國和日本在歷史發展中的社會生態和自然生態的變動，在從公元6-7世紀直至19世紀，我們可以在中國南方地區種劃分出具有相對“文化特徵”的四大“區域型態”來，這就是以日本“遣唐使”為核心的“蘇浙區域”（以揚州至明州即寧波一線為口岸基點）、以禪宗流布為核心的“浙閩區域”（以寧波至福州一線為口岸基點）、以大陸出口貿易為核心的“蘇浙閩區域”（以南京、漳州、福州一線為口岸基點）和以日本近代開國海外考察活動與文人異國體驗為核心的“上海區域”。上述四大區域在1300餘年的中日文化交涉中具有基礎性和決定性的意義。

我個人體會，中日文化交涉的這樣的“地理勢態”，在古代“東亞文明共同體”中至少在三個層面中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意義。

第一個層面是提升了中日文明交涉的“智力”品質。從6-7世紀開通了以東海為中心的中日南方交涉的通道，中國以長江流域為中心的文明形態開始與日本具有了愈來愈密切的關聯。綜合20世紀關於中國文明史研究成果，現在可以有把握地說，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學術界一般是把“黃河流域”作為華夏文明的唯一發源地，過於簡單了。自從以長江下游“河姆渡文明”和長江上游“三星堆文明”為中心的長江流域文明遺跡的相繼發現，具有科學價值意識的人文學者都已經認定華夏文明的核心其實是以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文明共同組成，“河江文明”已成定論。

正是在華夏文明這樣的“區域文化環境”中，中國“大江南”日益發展為中國文明的主要集散地區。中日之間構建起以中國南方為正面的、主要的交涉通道，對於當時正在發展中的“東亞文明共同體”具有極為積極的價值作用。例如，在佛教信仰領域，日本列島早期的“南都六宗”，主要是經由朝鮮半島傳入的，但關於“南都六宗”的主要的佛學經典文本以及法會典禮儀式等，則大部分是後來經由中日南方通道進入日本的。而從12世紀時代，“禪宗信仰”在日本逐漸發達起來，它的起始層面幾乎全部是依據中國南宋發育的禪宗為根本。中國杭州和明州（即寧波）兩地禪宗寺廟的五座大本山，便成為日本禪宗意念中的最高領地，在日本出現了“鎌倉五山”和“京都五山”，乃至如“甲府五山”等。一直到近代，禪宗經由日本而傳播到達北美洲。與此相應，在精神史層面，隨同禪宗的東傳，13世紀開始逐步萌發的儒學新學派“程朱理學”，繼而又有“陽明心學”，先後進入日本，積聚而成為江戶時代幕府意識形態的“內在主要成分”。還可以實證的有，例如從16世紀開始，中國江南地區逐步發展起來的以“話本小說”為中心的“市民文藝”，經過蘇浙閩的商業貿易大量進入日本，成為江戶時代從“假名草子”到“讀本”創作的重要養分，從而使日本的“讀本”創作成為東亞地區近代小說最先出現的“前衛藝術”形式。

在“東亞文明共同體”內同時存在着文化傳遞的另一層面，這就是日本文明也主要是經由海上交通和中國南方進入到中國的若干文化層面。例如八世紀時代在《萬葉集》編纂之前，日本“五七音律”的“短歌”已經由“遣唐使”成員傳入中國大陸，成為“和歌”向世界傳播的最早的起點。到中國清代年間，曾經是康熙股肱之臣的曹寅，《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在江南的“江甯織造”任上，於1709年在創作雜劇《太平樂事》中，有趣的是其中第七折《日本燈詞》則是運用“日語詞彙”和“漢語語法”混合寫成。這一稀奇的撰寫方法透露出了重要的文化訊息，這就是日本文化包括假名文字，在中國知識界有相當的影響。特別應該注意的是曹寅是在南京地區生活，可以想見這一區域已經成為中國接受日本文化的前衛據點。

第二個層面是提升了中日文明交涉的速度。在漢魏晉時代，文化交涉是經由“北方區域”的。例如，中國的“文獻典籍”材料由中國本土到達日本本土，從傳遞後果考察，一般需要一百年甚至兩百年的時間。但是，中日海上交通建立之後，文獻典籍的轉遞時間就愈來愈快速。8-9世紀時代中國著名詩人白居易（772-846）39歲時，日本嵯峨天皇已經採用白居易的詩歌對他的大臣進行考試了（《江談抄》文學第四）。中國的刻板印刷是在10世紀後期開始進行非佛教典籍的印刷的。大約半個世紀後即1010年，日本政治實際操縱者藤原道長已經收藏有宋刻本《昭明文選》和《白氏文集》了（《御堂關白記》寬弘七年（1010）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記載）。中日之間典籍的流布速度有了極大的提升。到了17世紀初期，中國南方福建地區出版的典籍，一般在3-5年內大部分都能夠到達日本，最快的甚至只要2年。同樣的，日本的文化信息也在這一文化通道中經由東海和中國南方的登陸基點而到達中國。12世紀中國已經獲得了日本假名文字的信息，14世紀中國獲得了完整的“いろは”音圖表，16世紀中國人在自己的著作中一次記錄日本和歌達到了60首，中國知識階層掌握的日語單詞達到近4000個左右，出現了完整的文學作品翻譯。所有這些互動的文化訊息，日本語也是通過“海上南方區域交通”而實現的。

第三個層面是提升了中日文明交涉的容量。中日交涉海上交通的開通和中國南方登陸據點的確立，改變了原來北方路線中“物質器物”和“文獻典籍”等等主要依靠“人背車載”的小容量，使交流的種類和容量有了極大的提升。

“阿伊努”時代中國與日本列島也有“物產”和“典籍”的交往，但是6-7世紀之後，它們傳播的數量與種類有了極大的提升。原本，日本列島把朝鮮半島的“韓”稱為（から），與“漢”同音。“から”就是“外國”，早期從大陸傳入的“物產”，都以“から”作為標志，例如，農耕使用的“鋤”（すき），是很早期從中國轉入的鐵制工具，稱為“からすき”（唐鋤），但自從開通“西海使”之後，日本人就將“とう”作為“輸入物產”的定語，“唐物”（とうぶつ）就是“唐からの物”，愈來愈多了，例如唐團扇（とううちわ）、唐胡麻（とうごま 蓖麻）、唐辛子（とうがらし）等等。其中，“唐本”（とうほん）成為日本人在中國收集與採購的極為重要的“物產”。9世紀末，由藤原佐世編纂的《本朝見在書目録》記載日本宮廷與中央機構收藏的“唐本”1568種共計17209卷。這個數量相當於當時中國《隋書》和《舊唐書》收錄與統計的中國本土書籍的50%左右。到了江戶時代，依據長崎港保存的官方記錄，在1693年到1803年的111年間，日本從中國南京、福州和漳州出發的中國商船中輸入“唐本”4781種。到19世紀20年代，中國書籍的80%以上已經輸入日本。一個國家擁有另外一個國家出版物的80%，這在世界文明史上既是極為罕見又是極為輝煌的景觀。依據王勇教授的“書籍之路”的論說，“書籍”的流動是構成文明流動的最重要的形態。從中可以發現“東亞文明共同體”內在的精神特質和持續不衰的基本原因。

## 結語

鑒於以上的基本理解，我個人覺得這次由中國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和日本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學會，對推進中國南方地區與日本列島之間文化交涉的歷史蹤跡考察，展現東亞古代文明共同體的實像研究具有很好的推動意義。前輩學者為本主題已經做出了許多業績，30年來，中日學者在這一主題中已經有了許多有價值的研究。80年代中國學者王仲殊先生主張“中國青銅鏡海上東傳日本”，90年代日本梅原猛先生主張推進以“河姆渡文明”

為中心的中國長江流域文明與日本文明關係的研究等等。今天在座的來自日文研的劉建輝博士早有大著《魔都上海》，更是以確定“上海”這一地功能變數名稱來涵蓋特定時期的中日文化交涉。所有這些研究對於推進本研究主題具有示範性意義。我本人將積極參加關於這一主題的相關個案的研究，並期待與諸位同仁有更好的協作，從而從整體上提升東亞文明史的研究。